

选择现代主义：一种审度科学的新立场

陈强强

(西藏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选择现代主义是科林斯和埃文斯提出的一种审度科学的新立场,对理解科学研究的第三波的理论取向和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简而言之,选择现代主义意指,从道德和价值的层面来看,现代社会依然应选择科学作为认识可观察世界的基本方式。选择现代主义不仅主张选择科学作为认识可观察世界的方式,而且要求应从价值和道德层面对科学进行辩护,重视专长与经验,从应然而非实然审视科学规范,技术决策应基于专家共识而非真理,应将技术决策划分为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反对技治主义和民粹主义,维护和贯彻科学的传统与价值是科学家与所有人的道德责任。之所以力倡选择现代主义,一是因为要抵御社会对科学的道德价值的侵蚀,进而捍卫科学;二是因为民主社会离不开科学。在科林斯那里,选择现代主义的合理性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选择现代主义面临立论基础薄弱、诉诸非理性主义、倒向新基础主义、是一种智者统治等多种批评。然而,选择现代主义也颇具启发意义,提示 STS 学者,是时候深入反思 STS 的历史了,但这种反思是一种避免绝对主义的审度,也是一种兼顾 STS 理论与实践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选择现代主义;审度科学;道德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3)01-0018-09

如何审度科学已然是当前学界及社会各界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能否以一种既新且合理的立场审度科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科林斯(Harry Collins)和埃文斯(Robert Evans)(下文只称“科林斯”)在 *Why Democracies Need Science* 中,提供了一种审度科学的新立场,即“elective modernism”。纵向地看,选择现代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第三波^①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反思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基础上,审度和捍卫科学^②的新立场,对技术决策的制度设计和当前的 STS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鉴于国内学界还未对选择现代主义予以应有的重视,本文尝试从多个层面对其展开探讨,是为抛砖引玉。

一、何谓选择现代主义

科林斯对 elective modernism 有明确的释义:“我们所说的 elective modernism 将科学视作一种道德选择:‘elective’一词意味着选择(choice),‘modernism’一词与科学相关。我们应该选择(choose)科学作为我们理解物理的、生物的、心理的及社会的世界——简言之,即可观察的世界——的方式。”^{[1]20}由此可知,“elective modernism”中的“elective”与“choice”“choose”相同或相近,可译为“选择的”;“modernism”则采用

收稿日期:2022-09-12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21SZJS54010695)

作者简介:陈强强(1988—),男,陕西清涧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① 本文将科学研究的“三波”分别简称为“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② 从根源讲,在尚未发起科学研究的第三波之前,即2002年,科林斯就在一定程度上尝试捍卫科学,这从其论文“Crown Jewels and Rough Diamonds: The Source of Science’s Authority”中可以看出。科林斯声称,“我将通过探讨科学家的勤奋、经验、技巧及鉴赏力,证明科学的有效性。”然而,彼时他并未十分明确地提出从道德和价值的视角审度和捍卫科学。参见 COLLINS H. Crown jewels and rough diamonds: The source of science’s authority// LABINGER J A, COLLINS H. The one culture? 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学界最一般的汉译,将其译为“现代主义”。在考虑汉语表达习惯的情况下,笔者建议将“elective modernism”译为“选择现代主义”。

要进一步澄清选择现代主义的内涵,需要明确科林斯语境中“elective”的含义。可通过追问两个问题深入探究“elective”的含义,第一个问题是,“选择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何选择?”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看似显而易见——“选择科学”,但实际上需要深究一番,因为历经第二波的科学在观念上发生了变化。科林斯认为,我们选择科学和重视科学专长,并非因为科学能够达致真理,也并非专家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这样能使技术决策作出“最佳决定”。“最佳决定类似于一个道德范畴:它是根据看似道德上最好的程序作出的决定。这种方式将是一种选择,而非逻辑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选择现代主义。”^{[2]167}与此同时,第二波对科学的解构及其建构主义立场导致人们不能客观地审度科学。科林斯认为,“科学大战”后的 STS 亟需一种新视角审视科学,以评估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关于科学技术的意见的特殊价值,^[3]但不能放弃科学。

科林斯选择的是价值和道德意义上的科学,而非真理和逻辑意义上的科学。这也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历经第二波后,我们之所以还选择科学,与其说是因为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不如说是对科学价值及其道德领导力的推崇,“科学应该因其道德领导力而受到重视”。^{[4]26}“对科学的理解一直有争议,但科学的价值是永恒的。”^{[1]19}由此,选择现代主义将审度科学的重心从真理与逻辑转到了价值之上。我们选择科学是因其永恒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颇为新颖的审度科学的视角。

要更为全面地理解选择现代主义,就必须把握其基本主张。选择现代主义有较为丰富的主张,可将其概述为以下八条。

其一,选择科学作为理解可观察的世界的方式。这个主张显然是个常识,似乎不需重申。但科林斯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重申和辩护的基本立场。STS 界与当前其他一些思想流派中的一些极端的观点认为,科学本质上与占星术无异,并无什么特殊之处。但选择现代主义依然赋予科学在理解可观察世界方面的优先地位,“选择科学作为我们理解可观察世界的方式,是选择现代主义的决定性部分。”^{[1]24}这同时意味着,选择现代主义认为,属于科学的领地只是“可观察的世界”。而且,“选择现代主义与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神秘现象的存在是相容的。”^{[1]67}那些迄今不属于可观察世界的事物在将来有可能成为可观察世界的内容,这也是科学的种种规范的内在要求,选择现代主义给自己留足了回旋余地。选择现代主义不同于一些极端的科学主义,它将科学理解的范围限定在可观察的世界;选择现代主义也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它并不否认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意义和作用,始终对未知领域开放。

其二,应从价值和道德层面对科学进行辩护,尽管这种辩护的基础是薄弱的(shallow)。换言之,“科学应该因其道德领导力而受到重视”,^{[4]26}这是科林斯最为新颖的观点之一。第二波已经表明了从科学事实(真理)、逻辑及实效为科学辩护的失败。因此,“我们选择专家时,选择的是那些享有科学的形成性愿望(formative aspirations)的群体,以及那些遵照这些愿望行事的群体,这是选择现代主义的核心。”^{[1]40}“科学价值而非科学事实和结果,是我们文化的核心。”^{[1]22}“选择现代主义视方法而非事实与发现为科学的关键。”^{[1]55}“选择现代主义认为,价值最终比事实更强大,且不是一种较弱的辩护方式。”^{[1]70}“在选择现代主义下,重要的不是科学或科学实践或科学知识被选择为我们文化的中心元素,而是‘科学价值’被视为民主社会的关键部分。”^{[5]189}这明显是基于第二波地发现,但又跳出了第二波的狭隘。第二波以民族志、实验室研究等考察方式,证实了科学知识(事实)的可错性,也揭示了科学作为真理神话的虚幻本质。因此,第三波主张从科学的价值和道德领导力及其对民主社会的作用等方面为科学辩护。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是选择现代主义与其他关于科学的“主义”区分开来的一个根本标志。选择现代主义也要求,在坚持第三波的同时,不抛弃第一波尤其是第二波科学的核心成就。然而,从规范层面为科学辩护,其“薄弱性”表露无疑。因为任何规范要求都是一种人为的“应然”,而非事实上的“必然”。在逻辑上,“应然”与“必然”天然且永远存在鸿沟。

其三,重视专长与经验。“我们看重观察的人,观察总比不观察好;我们说这些人有经验和专长。高度重视专长是选择现代主义的中心,正如它是科学本身的中心一样。”^{[1]20}只有这样,科学才不会沦为社会建构或政治活动。重视专长和经验的根本依据是,将科学视作一种生活方式,将科学家视作通过特定的社会化掌握贡献专长(contributory expertise)并遵从科学的形成性愿望的群体。也即是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掌握科学研究所需的专长和经验,它需要通过长期社会实践掌握包含在专长和经验中的大量默会知识而获得。这是对科学的独特性的强调,也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人关于特定科学主题的意见都同样重要,那些拥有相应专长与经验的群体的意见应享有更大的权重。这显然是科林斯对自己第二波时就显露出来的主张——尊重科学家的经验和技艺^[6]——的深化与完善。

其四,从应然而非实然审视科学规范。“在选择现代主义下,科学规范被接受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好的。在选择现代主义下,科学的旧哲学标准,包括确证和证伪,被当作某种事物来接受,尽管在逻辑的显微镜下审视它们是有缺陷的。……它们是有缺陷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规则像逻辑或数学规则那样纯净——在新的维特根斯坦/社会学的观点下,没有比‘游戏’对科学的定义更纯净了。它们被违反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规则是被纯粹地遵守的,真正重要的是激励‘生活方式’对科学价值的渴望。尽管科学价值有缺陷且被违背,但必须被选择。”^{[2]167}况且,在视科学为生活方式的情形下,群体对科学规范的遵守才是分析的基本单位(the basic unit of analysis),而非个体的行为。进一步讲,假如有科学家对失范进行颂扬或者鼓励,这意味着,“他们将自己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分离了出来”,^{[1]34}他们从事的活动不再是科学。因此,个体科学家的失范并不能摧毁科学规范,选择现代主义并未承诺科学规范在所有时空下有效,只是说它们本身是好的,是被大多数科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守的,是值得颂扬和倡导的。

其五,技术决策应追求最佳而非正确,应该基于专家共识而非真理。“选择现代主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和政治家应该建立在技术意见的共识基础上。”^{[1]84}“选择现代主义认识到,政治的发展速度太快,以至于不能等待科学,其目标是作出最好的决定,即使从长远来看这些决定是错误的。”^{[1]55}事实往往如此,步入后常规科学时代,技术决策的数量剧增、速度加快,但能为之提供依据的往往只是专家共识而非真理。暂不论科学最终能否获得真理,一些科学议题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会一直存在争议,即使这些争议来自一些边缘的反对意见,而这些反对意见已经“过了‘保质期’”^{[1]64}如果一味地考虑这些边缘的、“过了‘保质期’”的反对意见,那么专家共识将难以达成,技术决策也就无法作出。因此,技术决策只能是基于专家共识而非真理,是最佳而非正确。

其六,要求技术决策的技术阶段与政治阶段二分,^{[5]186}这与第二波的主张截然不同。“二分”的目的是使民主与科学不互相褫夺属于各自的领域。在科林斯看来,“不应该用科学知识来完成决策,因为民主总是胜过科学和技术。”^{[1]145}只凭科学知识决策,将导致技治主义(technocracy)。但也不能用政治阶段的民主过程彻底替代技术阶段的技术意见,否则将产生技术民粹主义(technological populism)。这条主张与科林斯重视专长和经验密切相关,无疑要将专家与门外汉关于技术争论的意见区别对待,因为“与技术阶段相关的仅存专长(only expertises)受科学的价值及其生活方式引导。”^{[5]192}况且,人们并不允许科学知识的命运完全由政治来决定。质言之,技术决策的技术阶段与政治阶段二分是解决技治主义和技术民粹主义的一种规范性要求。这个主张与第二波阵营的多数 STS 学者正好对立,因此,遭到了费希尔(Frank Fischer)、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温尼(Brian Wynne)等人的激烈批评,^[7-9]但这些批评都没有真正理解科林斯的这个主张。换言之,科林斯是在规范的层面(即“应然”)要求技术阶段与政治阶段二分,而批评者是在事实的层面(即“实然”)证明技术阶段与政治阶段不能二分。

其七,反对技治主义和技术民粹主义。尽管选择现代主义重视专长,但它并不是技治主义,而是反对技治主义。因为选择现代主义“视科学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通过应用一个逻辑和理性的过程所产生的一组真理”。^{[1]70}它并不承诺科学产生的就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也不承诺科学专家是最佳的决策者,

它承认技术决策要尊重政治偏好,且政治判断并不寄生于专家判断。“选择现代主义与技治主义的区别在于,承认专家意见并不等同于赞同或接受专家意见。在选择现代主义下,政策制定者没有义务采纳专家提出的任何政策,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拒绝。”^{[1]71}专家要做的是给出技术性意见而非最终的决策。与此同时,选择现代主义也反对技术民粹主义。因为选择现代主义重视专长和经验,认为不是所有人关于技术争论的意见都同等重要,这就是为何在技术决策中专门辟出技术阶段,给专家留下了一个相对自治的空间,但依然将技术决策的最终权力留给民主。这与科林斯将技术决策划分为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是融贯的,专家的任务就是在技术决策的技术阶段发挥作用,意在最大程度上抵制民粹主义;而政治阶段则是对所有人敞开的,是技术决策的民主阶段。由此,科林斯关于技术决策的主张成了一种“精英模式”与“民主模式”的组合。

其八,维护和贯彻科学的传统与价值是科学家与所有人的道德责任。一个良性的民主社会需要作为社会文化核心元素的科学的价值的支撑,这就需要“为科学在社会中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1]4}也要求科学家依然按照第一波提出的科学规范从事科研活动。科学规范“之所以坚韧,是因为大多数科学家持有旧式的(old-fashioned)世界观,即这些价值不仅能而且将(让科学家)获得事物的真理。这是第一波的世界观。”^{[1]37}因此,这条主张是反技术民粹主义和过度科学民主化的,也是反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捍卫科学的价值似乎是一种不需多加辩论的道德常识,科林斯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个常识,主要是基于对第二波的反思与批评。第二波对科学的全方位解构、科学步入后学院科学时代等对科学的价值构成了威胁,因此亟需重申科学的价值及其对民主社会的重要性。但科林斯并非完全摒弃第二波的合理成果,而是一种纠偏。如果一味地将第二波贯彻到底,就有可能导致“STS在理智上的破产”。^[10]

二、倡导选择现代主义的理由

任何一种“主义”的提出都有其充分必要的理由,否则它将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也终将难以被人们接受。概括起来,科林斯倡导选择现代主义的理由主要有三个。

理由一,需要抵御各种非科学因素对科学的侵蚀。一方面,科学的道德价值正遭受市场化、民粹主义等外部力量的侵蚀。^{[1]5,9}正如雷斯尼克(David B. Resnik)指出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大学和学院改变了他们以往对科研成果商业化的暧昧态度,”其中的三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寻求科研经费,学术界开始接纳商业精神,以及学术界试图与产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1]1}科学活动的商业化和民粹化势必影响科学研究及其结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科学之所以被推崇,不仅因为其力量(Power),还因为其道德价值,即它对非刻意受非理性因素影响的理性精神的遵循。当科学遭受非科学因素的侵蚀时,全社会都应该捍卫科学免受或尽量少受侵蚀。另一方面,科学也遭受学术界等内部力量的侵蚀,主要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环境主义者、STS和科学失范等的侵蚀。例如,面对政治等各种非科学因素对科学认知的影响,第二波的态度是放任自流:“因为科学受到政治的影响,我们应该忘记两者的区别——在科学问题上采取政治行动,就是采取科学行动。”^{[1]30}这是最极端的一种观点,即认为科学与政治无异。著名STS学者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科学不是政治,它通过其他方式成为政治。”^[12]这个观点显然与一些极端的相对主义者不同,因为它在根源上认同科学及其价值的独特性,哪怕这种“独特性”只是相对的。身处第三波的科林斯也反对将政治与科学完全等同的观点,相反,科林斯极力主张应站在规范立场上,将科学与政治等非科学因素分开。与此同时,科林斯认为,部分科学依然未受侵蚀,绝大多数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遵循科学规范行事。“在科学像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被自由市场海啸淹没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科学的特殊性质,并向社会展示科学代表的东西。”^{[1]9}

理由二,科学能为民主社会提供道德领导力,^{[1]7-8}这是一个颇为新颖的观点。第二波对科学的实际考察表明,科学并不独立于社会,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密切共存,科学内部也充斥着各种非理性因素。因此,第二波极力抹平科学与政治的界限,甚至将科学视作政治的延续。但第三波与之正好相反,它

维护科学与政治的二分,以使科学获得相对的独立性。^{[1]7}只有这样,科学才能保持自身的道德领导力,从而有益于社会。科学作为当代的一种重要文化,一旦失去自身的价值规范,那将是全社会的灾难与损失。一般认为,民主属于政治范畴,科学属于真理范畴,二者互不统摄,也少有交集。科林斯却独具慧眼地发现了科学与民主在价值方面的重合,也认识到了民主需要科学的维护与支持。科林斯之所以在科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持规范立场,是因为他认为,“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有保护民主的潜力”。^{[1]8}更重要的是,在科林斯看来,科学和民主倡导一些共同的价值,科学的一些价值也是民主的价值。这实际上是科林斯对默顿观点的发展,“我们认为民主需要科学,因为科学是或者可以是良好价值的源泉。尽管对科学的理解充满争议,但科学的价值是永恒的。”^{[1]19}“将科学维系在一起的价值与将民主社会维系在一起的方式有重叠之处。”^{[1]24}当社会不再良性时(如二战时法西斯的盛行),人们亟需科学家和学术团体的独立,以使科学为社会提供一种“道德领导力”,因为“好的行为内在于(intrinsic to)科学存在的理由”。^{[1]9}科林斯与默顿的最大区别是,科林斯是从应然层面看待科学的各种规范,而默顿是从实然层面看待科学的各种规范。默顿的立场必然导致他提出的各种科学规范很容易被驳斥,因为失范必然会在实际科学活动中发生。而科林斯不会,因为科林斯不认为所有科学家在所有科学活动中始终在遵守科学规范,只是要求科学家这样去做。科林斯认为,当前民主深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攻击,亟需一种价值源泉,科学有提供这种源泉的潜力。科学与民主至少在普遍主义、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开放性、个人主义和大众观点之间的张力、重视和培育专长与经验等六个方面有所重叠。“科学的价值也是民主的价值。……科学自身及其生活方式为民主的实现提供了实质内容。”^{[1]45}

理由三,为科学提供新的辩护。基于何者为科学辩护,贯穿于科学研究的始终。第三波认为,第二波地发现使得第一波基于理性和实效对科学的辩护都难以成功,而基于道德-价值为科学的合理性辩护是一种更优的策略。换言之,既然基于理性与实效为科学的合理性辩护已经难以经受住考验,那么为科学的合理性寻求一种坚实的辩护势在必行,从道德-价值层面出发的选择现代主义是为科学的合理性辩护的一种更具韧性的辩护策略。与此同时,科林斯认为,基于理性和实效对科学的辩护与基于道德-价值对科学的辩护并不矛盾。当科学的理性辩护和实效辩护不奏效时,基于道德-价值的辩护依然成立。退一步言,基于道德-价值对科学的辩护并不需要预设一种完美的科学理想,甚至可以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不完美的。由此,基于道德-价值对科学的辩护是一种更具韧性的辩护,其根基不是科学的知识、事实或实际成功,因为这些总不够完美和坚实,它的根据是科学的价值。说到底,价值根本上有别于事实,它不承诺自身总是能被实现,而是倡议被追求,即科学的价值作为一种人类应该不懈追求的最高理想之一。

三、选择现代主义的自明合理性及其批评

科林斯认为,选择现代主义的合理性是自明的,称之为“启示”(revelation)。^{[1]19}科林斯通过“虐童是一种不道德行为”的哲学论证的失败为例,对选择现代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科林斯的例子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熟人坦然自若地虐童,且声称自己研究了道德哲学但并未从中找到有关虐童是错误的行为的判决性证据(decisive proof),因此不认为虐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科林斯认为,要从哲学上为虐童行为的不道德提供判决性证据不仅是毫无希望的,而且是有违实际情形的。因为“道德行为的一个特点是,我们在作出这样的选择时,并不为此寻求判决性辩护。抛开哲学家不谈,哲学上的辩护并不是道德判断的来源。”^{[1]19-20}类似的是,科学哲学家卷帙浩繁地对“科学是最好的”的辩护,与道德哲学家对“虐童是一种不道德行为”的论证一样,并不很成功。在虐童的例子中,当每个人都完成自己的论证之后,剩下的只有一点:“你只知道对孩子进行无端的折磨是错误的”,^{[1]23}但这点并不是来自哲学论证。科林斯认为,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选择科学及其专长就像选择任何道德行为一样,是一种即使在缺乏判决性证据的情况下依然要选择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基于道德基础对科学的捍卫与其他道德论证一样,帮助我们注意到自己的行为 and 思维方式。”^{[1]20}科林斯指出,与其说他们所作的是论

证,还不如说是“启示”。换言之,科林斯是在提供一种规范性提议(proposition)。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就比其他方式在观察世界方面更为有效,“它并不意味着在任何事情上做得更好,它只是意味着更好。”^{[1]20}

由此,科林斯将选择现代主义建立在“行”(实践智慧)而非“思”(逻辑论证)的基础之上。它不同于理性主义的逻辑奠基方式,而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实践奠基方式。他通过人们不言而喻地选择不虐童的道德案例,意在表明当代社会选择科学的自明性。换言之,选择现代主义是一种实践智慧,“它建立在某些道德信仰和行为的不言而喻的善的基础之上。”^{[1]23}但很明显,科林斯只是用一种类比替代论证,即用“虐童是一种不道德行为”的哲学论证失败替代为科学辩护的“判决性证据”的失败。由于这种类比,也减弱了科林斯所给理由的力量。

显然,选择现代主义并非基于一种严谨的论证,这是它遭受批评的深层诱因。与此同时,选择现代主义的一些主张与第二波存在根本分歧,这也为对它的批评埋下了伏笔。

批评一,薄弱的基础。与其说选择现代主义建立在一种严密逻辑论证的基础上,还不如说它建立在一系列选择之上,这为批评选择现代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科林斯也承认,他未像以往对科学的辩护那样,给出严密的辩护逻辑,而只是对一种“选择”的论述。“全部论点的基础——对民主的偏好和对科学价值的偏好——像空气一样薄弱,并承认民主的价值和科学的价值之间有很强的重叠,这个基础是一个没有进一步论证的选择。”^{[1]149-150}“选择现代主义的精神是新的,但大部分肉体是旧的。”^{[1]36}尤其突出了对默顿规范的新诠释。在回顾过去几十年的争论时,科林斯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次又一次的学术会议、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暴行表明,当真正重要的事情被关注时,理由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必须作出选择。”^{[1]152}由此可见,科林斯之所以从“论证”走向“选择”,是因为他认为,再多的论证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就像伦理学家和哲学家不能为道德行为提供“判决性证据”一样。吊诡的是,科林斯似乎又不认为选择现代主义的论证基础是薄弱的。“选择现代主义主张,只有认为道德选择和对专家的偏爱是薄弱的,那么对科学的有力辩护才是薄弱的。”^{[1]55}科林斯的言下之意是,把道德选择作为选择现代主义的基础和为科学辩护的理由并不薄弱。尽管科林斯并未放弃从逻辑和实效的层面为科学辩护的努力,但无疑更偏向从道德和价值的层面为科学辩护。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明白道德选择在现实生活中的脆弱性。如果道德选择是一种很强的辩护方式,那么法律等非道德方式则无用武之地,也无存在的必要。结合下一条批评,我们就会明白,选择现代主义依然难以逃脱这样一种诘难:道德选择不仅本身是软弱的,而且是对用其他辩护方式为科学辩护的妥协。

批评二,诉诸非理性主义。选择现代主义为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辩护方式,即道德-价值辩护方式,但这种辩护方式本质上诉诸的是非理性主义。就像孟子的“四端说”,用一句“人皆有之”省却了所有的理性论证。对于为何要选择科学作为理解可观察世界的方式,科林斯的回答比较模糊,甚至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似乎人天生就有判别好的价值的能力,这是一种天赋的直觉能力。这意味着选择现代主义诉诸非理性主义,直觉能力不需要任何理由,导致科林斯在此问题上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与此同时,选择现代主义也被赋予较浓的理想色彩。它的理想色彩主要体现为,科学的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且这种道德地位是先验的,甚至是不容置疑和无需辩护的,是一种无需“判决性证据”的选择。进一步而言,科林斯认为对科学的选择类似于对道德行为的选择,二者都没有(也无需)“判决性证据”。“选择现代主义只是认为与科学相关的价值不言而喻是好的,而不需要辩护。”^[13]但这导致选择现代主义有诸多未得到很好解释与论证的地方。事实上,科林斯的处理方法不免有偷梁换柱的嫌疑。科林斯似乎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因为科学的价值是好的,是不言而喻的和不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所以无疑要选择科学。但这种逻辑推理显然是软弱的,因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表明:科学的价值是好的且是不言而喻和不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除非认为人天生就有这种明辨好坏的能力。然而,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常常充满了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而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也是科学研究的第二波广受诟病的重要原因。总之,选择现

代主义诉诸非理性主义是危险的。退一步言,即使学者们迄今未能在理性主义的范畴内为科学作出成功辩护,科林斯也不该彻底放弃理性主义,因为以往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以后不能成功对科学作出理性主义的辩护。

批评三,落入新基础主义的窠臼。选择现代主义对作为逻辑机器的科学作了有力批判,^{[1]54-56}这意味着,科林斯并不打算为科学寻找一种逻辑上的终极基础。但遗憾的是,选择现代主义并未落入逻辑上的基础主义,但却落入了一种新的基础主义。至迟自笛卡尔起,哲学一直有一种基础主义情怀,学界又称之为“笛卡尔式焦虑”,即想为哲学思想找到永久的理论基石。这块“理论基石”在笛卡尔那里是“我思”,在其他哲学家那里也有其所指,但总归是相同的,就是想一劳永逸地为哲学找到终极基础。20世纪上半叶,“笛卡尔式焦虑”在科学哲学中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充分表现了出来。但20世纪后半叶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哲学家论证了基础主义的不可能,同时也表明“笛卡尔式焦虑”的荒诞。就像伯恩斯坦所说:“我们被告知,许多哲学家的梦想或希望——把握世界的永恒视角(sub species aeternitatus)——是一种欺骗性的幻觉,会导致教条主义甚至恐怖。”^[14]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尝试为哲学找到一块永久理论基石的努力却从未停止。问题是,科林斯摒弃了逻辑基础主义或者说理性基础主义,却倒向了一种新的基础主义,即将道德选择视为对科学辩护的终极基础,可称之为“道德基础主义”。这意味着,无需对“道德选择”进行哲学追问,道德选择是一切的基础。但将道德选择视为科学的终极基础是不牢靠的,因为道德选择本身就是不牢靠的,其间充满了非理性主义。这一切都表明,像其他很多主义一样,选择现代主义并未逃脱基础主义的窠臼。况且,选择现代主义拥抱的“道德基础主义”似乎更加脆弱。

批评四,选择现代主义是一种智者治国(epistocracy)。^[15]科林斯认为,他们是在“为科学找到一个支持民主而不篡夺民主的角色”。^{[1]152}批评选择现代主义是智者统治的主要依据是,科林斯将技术决策的技术阶段的发言权只给了专家,公众缺席了,而赋予公众在技术阶段的合法性是第二波部分 STS 学者长期努力的目标之一。科林斯对此并不否认,技术阶段的“参与基于精英原则,它直接源自以下观点,技术阶段是关于专家知识的。”^{[1]30}然而,科林斯并不主张将精英原则贯彻到技术决策的政治阶段,因为政治阶段基于民主原则。“科学和政治虽然相互联系,但不能相互转换。”^{[1]65}这意味着,政治阶段对技术决策具有最终决定权,技术阶段的专家共识只是为政治阶段提供的可选意见。因此,科林斯从不认为和主张选择现代主义是智者治国。但在现实中,处于技术决策技术阶段的专家往往具有主导地位,他们在技术阶段的意见(共识)常常左右着技术决策的政治阶段。也就是说,尽管理论上赋予公众在政治阶段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力,但现实中公众因缺乏独立的甄别能力和判断能力,最终的决策还是被专家所左右,甚至决定。因此,对选择现代主义是一种智者治国的担忧不无道理。

四、几点启示

首先,STS学者是时候深入反思 STS 的历史了!科林斯在提出选择现代主义时,简要地回顾和深刻地反思了科学的社会研究几十年的历程。一者,发展了几十年的 STS 理应步入反思阶段了;再者,科林斯要为他倡导的选择现代主义及相关的观点扫除障碍。当第二波阵营的 STS 学者在继续解构科学的时候,科林斯却大声疾呼捍卫科学及其价值。诚如科林斯所说,选择现代主义是对 STS 以往观点的新发现和重申,它并未抛弃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合理成就,而是充分利用了它们。然而,这是一种基于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利用”。对于国内 STS 而言,这种“深入反思”也很有必要。相比于国外 STS,国内 STS 并未真正经历过第一波和第二波,更多的是述介国外 STS 的成就。面对科林斯等人掀起的第三波,国内 STS 应该积极参与进去,在深刻反思国外 STS 历史的同时,深刻反思国内 STS 的历史与走向。

其次,避免绝对主义。无论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都未能避免绝对主义。第一波几乎将科学与真理等同,视科学家为在科学实践中不掺杂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的中立者,将科学实践与其他人类活动严格区分开来。第二波通过对第一波的彻底批判和否定,将科学推向了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甚至抹掉了

科学实践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区别,这事实上是另一种绝对主义。在第一波那里,对科学的偏颇认识主要体现在为将科学及其实践神话化,以捍卫科学的完全独立性,也即 STS 中所谓的科学例外论。在第二波那里,对科学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察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不免对科学的哲学考察有所淡化,由此几乎将科学的独特性抹掉,大大降低了评论科学的门槛。但迄今的研究足以表明,科学实践既不完全有别于其他人类活动,也不完全同质于其他人类活动,科学有其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之处是人类必须捍卫科学的根本理由。

再次,从辩护走向审度。对科学技术进行审度,是近年刘大椿教授等 STS 学者极力提倡与探究的新取向。“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16]很显然,审度科学与选择现代主义在根本旨趣上有异曲同工之处。简言之,二者都走出了看待科学的狭隘视野,皆持宽容态度。换言之,审度科学之“审度”与选择现代主义之“选择”都旨在寻求一种看待科学的“中道”——一种客观地审视和反思科学和 STS 的新路径。在经历了第一波辩护科学、第二波批评科学之后,国内外 STS 学者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一条审度科学之路。这无疑代表了当前科学观念的一种深刻转变,值得 STS 学者深思。

最后,STS 学者应该兼顾理论与行动。针对 STS 对科学和人类社会有何作用的问题,科林斯通过构想“猫头鹰”技术决策制度给予回答,^[17]这也是选择现代主义的内在要求。面对纷繁复杂的技术决策,STS 学者只能作理论探讨吗? STS 学者能不能参与技术决策呢? 科林斯将技术决策划分为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且从应然层面尽力划分事实与价值,都为 STS 参与技术决策提供了理论前提,科林斯也通过构想“猫头鹰”技术决策制度,大胆地跨出了 STS 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步伐。国内在技术决策的制度设计方面还有很多亟需完善的地方,如何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技术决策制度? 如何在技术决策中将 STS 学者和公众充分吸纳进去? 国内 STS 学者如何从理论走向实践? 如何兼顾理论与行动? 都是当前国内 STS 必须认真思考的事项。

尽管选择现代主义对重新认识、理解、辩护科学和技术决策有重要启发,但也面临较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第二波阵营的 STS 学者对科林斯的系列主张和观点并不怎么认同,更多的是批评。然而,在 STS 前进的道路上,如何审度科学和为科学辩护,依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COLLINS H, EVANS R. Why democracies need scienc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 [2] COLLINS H. The role of the sociologist after half-a-century of studying science[J]. South Af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2013 (1).
- [3] COLLINS H, EVANS R.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2(2): 235-296.
- [4] 马塞洛·费茨,哈里·柯林斯. 消解 STS 中的坚冰——马塞洛·费茨对话哈里·柯林斯[J]. 李秋甫,译.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 [5] COLLINS H, WEINEL M, EVANS R. The politics and policy of the third wave: New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J].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2010(2).
- [6] COLLINS H. Crown jewels and rough diamonds: The source of science's authority[C]// LABINGER J A, COLLINS H. The one culture? 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255-260.
- [7] FISCHER F. The 'policy turn' in the third wave: Return to the fact-value dichotomy?[J].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2011(3): 311-316.
- [8] JASANOFF S. Breaking the waves in science studies: Comment on H. M.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3(3): 389-400.
- [9] WYNNE B. Seasick on the third wave? Subverting the hegemony of propositionalism: Response to Collins & Evans (2002)

-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3(3): 401-417.
- [10] COLLINS H, EVANS R, WEINEL M. STS as science or politics?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7(4): 584.
- [11] 戴维·B.雷斯尼克. 真理的代价: 金钱如何影响科学规范[M]. 蔡仲, 韦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7.
- [12] LATOUR B.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M]. SHERIDAN A, LAW J,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9.
- [13] COLLINS H. Three waves of science studies[C]//BURGUETE M, LAM L. All about science: Philosophy, history, sociology & communic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4: 251.
- [14] BERNSTEIN R J.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5: 4.
- [15] EVANS R.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the third wave: Elective modernism not epistocracy[C]//HOLST C. Expertise and democracy. Oslo: ARENA,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Oslo, 2014: 85-102.
- [16] 刘大椿, 等. 审度: 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2.
- [17] 陈强强. “猫头鹰”: 一种技术决策制度的新构想[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2(11): 71-76.

Elective Modernism: A New Standpoint on Science

CHEN Qiangqiang

(School of Marxism,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nxi 712082, China)

Abstract: Elective modernism is a new standpoint of examining science put forward by Harry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In short, elective modernism implies that, from ethical and value perspectives, modern society should choose science a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understand the observable world. Besides that, it is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sts and all people to defend science from ethical and value perspectives, to value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and to examine scientific n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at they should be” instead of “what they are”. Moreover, technical decision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phases, should be based on expert consensus rather than the truth. Technocracy and populism are expected to be opposed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implement the traditions and values of science. Resisting the erosion of science by moral values, the need for science in democracy, and providing a new way to defend science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advocating the choice of elective modernism. In Collins, the rationality of elective modernism is taken as self-evident. However, though elective modernism faces a range of criticisms, such as weak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esort to irrationalism, tendency towards new foundationalism, and being an epistocracy, elective modernism is also instructive, which suggests that it is time for STS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scholars to reflect deeply on the history of STS. This reflection is expected to avoid the absolutism, and it is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o balanc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S.

Key words: elective modernism; considerate science; morality

(责任编辑: 江 雯)